

如何认识打工问题？怎么做才能改变打工命运？你感到困惑吗？
《蓝白仓库》为你奉献自由之路！



蓝白仓库

吉峰 © 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蓝白仓库

吉峰◎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白仓库 / 吉峰主编.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491-0233-4

I. ①蓝… II. ①吉… III. ①劳动就业—基本知识—中国 IV. ①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464号

蓝白仓库

吉 峰 主 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打工的人们，
纪念这个打工者创造的时代！

序一：打工经济



茅于軾
经济学家

这是一本为打工者写的书，它介绍了打工者需要知道的各方面知识，既适合于蓝领工人，也适合于白领打工者。严格讲，蓝领白领并没有很清楚的分界线，他们都是打工者。这也是本书有别于其他打工书籍的一个方面。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两三亿农民进城打工，外加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就业市场有了空前的扩大。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正面反面的故事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讲“打工须知”一类的书出版。但本书不同于过去所出的书，最主要的是作者吉峰本人就是打工者出身，自己有切身的经历，书中涉及到打工者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识，包括来到一个新环境所面临的和在打工之外的各种问题。而且吉峰有企业管理经验和劳资关系方面的学识。所以他能写出如此内容丰富的书来。

我喜欢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打工者自己写出来的，而不是旁观者写的。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会有完全不同的体会。我们常说，真正底层群众的声音很难被听到，能够听到的往往是旁观者的声音。有时候这些作者并不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道听途说，以谬传谬。更糟糕的是为了哗众取宠，说一些貌似为了穷人，实质是误导穷人的言论，极大地混淆了视听。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太多了，可是大家依然容易上当受骗，这真值得我们总结一下教训。现在这本书不会误导大家，所以我愿意推荐给广大的打工者和读者们。

改革开放30多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打工问题，已演化成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户籍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和公平正义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打工经济”（农民工以承受低工资为代价的经济模式和成果）。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涉及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各方，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愿他们看了本书会有所认识。简单归纳起来说，就是保护打工者的基本权益，他们的生存权、工作权和人生权，工作中没有危及生命的环境；他们有权自由选择、讨价还价和集体谈判，有权自由工作和权益申诉，没有理由遭受不予受理和不予立案，而且案情能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

2010年12月9日 北京

序二：农民工与民工荒的解析



郭 军

中华全国总工会

民主管理部部长

我和吉峰是在一个研究劳动关系问题的场所偶然相识的，那时在劳动关系、劳动法学界认识他、了解他的人可能并不多。当他拿出《蓝白仓库》的文稿希望我能够提出些许意见时（书原名为“打工手册”），我既好奇又惊讶。写打工者，如写农民工和给农民工写的书是有的，但是，写农民工的大多数是描述农民工的艰辛、奋斗、成功与失败的，给农民工写的书大多是法律知识的普及手册，告诉农民工如何签劳动合同、如何打官司的，总感觉是对外人对农民工的观察、教育，似乎和农民工的关系不够那么亲和那么贴近。而吉峰认为自己就是农民工，他是以“农民工”的角度来设计和编写这本书的，所以他定位是：一本工具性、故事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书籍。以打工的工作状况、个人发展和城市生活三大部分为主，打工者写的稿件占70%，读者对象是打工者中的蓝领、白领、农民工群体和企业管理者。他自我的评价是以“自教育和共言说”为本书特色，其形式和内容是从未有过的。虽然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是它的确够独特。

其实，它最大的特色是从打工者的自我而不是被教育的对象角度来写的，是从打工者是社会人而不是简单地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角度来写的，后者尤其突出。本书是把打工者作为有血有肉有着多种需求的人来看待的，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被企业购买来的商品和一个挣钱的工具。所以吉峰甚至没有直接去谈怎么签劳动合同，怎么去主张权利，怎么打劳动争议官司等等，这是社会上提供给打工者的维权手册、指南常常去做的一些事

情。他没有涉及劳动权益、劳动争议等这些所谓的“常识问题”，而是从一个对城市生活、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安身立命的劳动关系的前景很大程度上懵懵懂懂浑然不知的背景出发，从怎么找工作、怎么去生活等等问题出发，顺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足迹，自然而然地展开了。书分九篇：准备篇；工作篇；个人事务篇；城市生活篇；人生发展篇；婚恋家庭篇；知识篇；打工故事篇；共言说篇。他努力把作为一个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包括进来。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吉峰把视野更多地投入到了打工者的社会人、城市人的生活领域，努力触摸、触碰甚至触动打工者的心灵，正如他自己说的，“既有如何面对城市生活，也有通向人生终极的存在意义和为人的道德指引”。这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打工者就是匆匆的城市过客，他们只关心挣钱，他们是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娱乐、不需要社交、不需要独立思想的，他们是不需要尊重、不需要人格、不需要仪容的；他们是不需要爱情、不需要亲情、不需要性和家的，起码在城市是不需要的。所以许许多多的人是藐视打工者的，许许多多的企业是漠视农民工的，许许多多的城市是忽视打工者的。这正是今天的“民工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得不到应有收入、得不到应有尊重、得不到应有未来保障的人凭什么要留恋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城市？所以，在前几篇的打工知识主题中，吉峰关注更多的是具体问题的面对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高深莫测的大道理。

何谓农民工？

“农民工（打工者）”是一个令人十分纠结的词，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内涵外延就有着不同理解和多种多样的解释，争议多多也恰恰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正如作者将自己也界定为农民工一样。吉峰试图对农民工的定义做个清晰的界定，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困惑，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沿海工厂的兴起，打工仔、打工妹，变成了农民工。随后一段时期演化成多种同义不同名的称呼，如：打工的、劳务工、外来工、临时工、临聘人员、合同工、蓝领、白领、农民工、员工、工人、职工和劳动者。这些带有特殊符号的称呼，在本书中都泛指一个意思表达，即离开家乡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和劳动者。”我一直

好奇地想知道，“农民工”这个词，是谁第一个使用的，当时他使用这个词时，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通过网络搜索和向专家学者咨询，没有找到确实的信息，只了解到这个词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

农民工的定义是什么呢，列出以下三种说法：

一、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就是农民工。二、农村户籍的人到城镇以务工方式谋生的就是农民工。但这种说法将一些非农户籍的劳务工、临时工、合同工、外来工等排除了，而这些人的政治权利、经济状况和农村户籍的打工者是一样的。三、凡是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政治权利、经济状况与工人或市民不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权益的劳动者，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个很令人纠结的概念，农民？工人？在乡村企业工作的农民？在城镇工作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吉峰的困惑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困惑。严格来说，中国今天是不存在农民工的，因为自1995年《劳动法》正式生效实施后，所有的企业招用职工都得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不论签劳动合同前你是做什么的或是什么身份，签了合同后都是签约企业的正式职工，如果说有区别，那仅仅是合同的期限、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等相关的不同，但是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都要执行统一的最长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工资标准的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标准条件的规定，以及社会保险和劳动争议处理规定，这在劳动法上来讲是从来没有身份差别的，都是企业的职工，而不是什么农民工。实际上，在劳动关系中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差别是明显的，一方面是工资、工伤赔偿待遇和福利，这只能说是企业缺乏法律意识，有歧视嫌疑，而不是法律制度上有障碍；另一方面，其实真正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险问题上和社会福利方面，这恰恰游离开了劳动关系，是社会问题、身份问题，这与农民工子女就学、农民工住房等问题是同样的，原因是农业户籍。这也是农民工这个称谓一直还频频出现，甚至出现在政府的文件政策中的原因。但是，我们每每看到了农民工不利的一方面，农民工有自己的优势的地方却被忽略了。国际金融风暴来临，大量农民工被辞退，但是没有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其核心原因就是农民工还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即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承包地、宅基地随着城镇化将会是和应该是一笔可观的资本，起码在农民工失

业的时刻，他有个退路和基本保障，这是城市无产阶级的职工所不具备的，也是农民工称谓还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这样看来，农村户籍的到城镇务工谋生的人就属于典型的农民工。这当然不包括自许为农民工的吉峰。

吉峰说，改革以前，没有“农民工”这个词，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那时有农民工也是事实，在当时就有季节工、轮换工、临时工等制度，而且对农民轮换工人的使用是有不超过八年的限制的。吉峰说，“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出现了‘农民工’一词，字面意思是指进城打工的农民，而实质内容是，进城务工干着和过去工人一样的活，但却不能得着工人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人”。这个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何来民工荒？

每年春节过后总有一些地区出现用工荒，而且今年情况似乎格外严重，特别是大规模的“民工荒”，此事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民工荒”对我们社会和企业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性信号：当前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管理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劳动关系在总体稳定的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隐忧。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认识需要做一个较大幅度的调整。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调整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工荒不是今天首次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农民工涌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似乎这样的劳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在一些特定时间点上、一些特定的岗位上出现了用工荒。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民工荒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春节前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在春节前主要是社会用工荒，如保姆、医院的护工等社会化服务的个体劳动者紧缺，同时企业的农民工也由于如避开春运高峰期等种种原因而提前离开工作的企业。然而企业农民工的短缺主要还是表现在春节后，因为部分农民工回到家之后出于许多原因而不愿意再出去到外面打工，例如自身的身体状况不好、结婚、照顾老人和孩子等一系列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打工的工资太低了，工作时间太长了，劳动条件太差了。有一些是直接跳槽到待遇好些的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了，如一度在珠三角出现的用工荒，在长三角却没有出现，差别只是长三角多数企业除了工资大多管吃管住。看似很小的区别，对于农民工来说却

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有的感觉背井离乡异地打工不划算干脆不出来了。当时政府和工会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提供更多、更快捷的就业信息服务，甚至在一些农民工输出比较集中的地方组织劳务输出，工会也因此应运而生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联动的维权模式。一些企业也在进行改进，包括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是接送农民工回乡。因此，过去这样的情况只是在局部地区的部分企业出现，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大。但是这次大规模爆发的“民工荒”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醒目的警示，即我们的劳动关系、企业的管理理念是不是可持续的，是不是公平公正合法合理的。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劳动条件太差是不争的事实，而欠薪和随意裁员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么一旦劳动者有了更好一点的选择，“血汗工厂”出现“民工荒”是必然的、迟早的事情。现在劳动者这样的选择自由和意愿真的来了，一方面是我们的政策带来的，即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距缩小了，西部开发等政策使得各地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就近务工的机会增加了。对于农民工来说，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出务工只能获得较低收入的同时，要支付不断增高的生活成本，如每年春运期间往返途的艰辛和高额路费，以及户籍、身份的歧视和背井离乡情与性的折磨……这一切使得外出务工和在本地务工务农的收入与消费比及幸福指数越来越不成比例。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再有外出打工的渴望的，这种情况不改变，“民工荒”就是必然的了。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一代农民工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由于务农没有什么现金收入，出来打工挣到现金就很满足了，打工挣钱回家盖房娶妻或者供孩子上学就是直接的目标。而二代农民工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生的追求已远远不是一代农民工的想法。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希望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的，因此对务工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赚钱，赚更多的钱，他们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需要解决发展问题，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格尊严。如果企业不注意这种差异和这个变化，即使工资不低，同样也招不到工人，这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长期导致一些还停留在过去用工理念上的企业出现民工荒的问题。最近新闻报道大量的求职者蜂拥至深圳富士康公司，昼夜排队挤爆大门。在“民

“民工荒”的背景下出现如此现象十分有样本意义，其实不过是富士康用工规范了一点，不高的工资按时发放且不会欠工资而已。还有二次求职者将管洗衣服也作为应聘原因之一，这大概真是“80、90”农民工的特色了。

今天突然爆发的“民工荒”其实应该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民工荒”是另外的一种危机。金融风暴刚爆发的时候，第一轮出现的现象是什么？是老板弃厂而逃，是裁员潮，是欠薪、减薪……所有国际金融风暴下的乱象，其背后都有内在的逻辑，即劳动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者只是被购买来的商品，劳动者是被资本养活的对象……在抗击国际金融风暴过程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逆势发展。是谁扛起了这样的千斤重担？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告诉全世界，答案是中国的农民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民工荒”，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地发展，一方面也反映出以往的劳动关系和企业管理理念出现了问题。“裁员潮”与“民工荒”，这两件事是有直接的关联关系的。国际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企业第一反应是自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裁员，包括更恶劣的弃厂而逃等现象都不稀见，此时就存在着对企业发展模式和管理理念的一种考验，即你到底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你是把企业作为事业来做，还是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来办，不同的理念会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结果。面对国际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在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上，在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上，应该说功不可没。《劳动合同法》使得大量的企业有所忌惮，有所顾虑。而依照《劳动合同法》没有裁员的企业，今天笑到了最后，这样的企业当然不存在“民工荒”，更有可能是出现富士康那样的排队应聘潮。“裁员潮”与今天的“民工荒”的关系是因为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包括中国企业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被老板一脚踢出企业了，“被回家”了，后来东莞连续出现了两起影响较大的企业员工把企业经理、老板杀掉的恶性事件，直接起因是解除劳动合同，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企业的一些管理者习惯于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即我投资的企业我所有、我说了算，劳动者就是购买来的商品，我老板让你来你就来，让你走你就走，如果不满的话，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这些话我们都耳熟能详、习以为常了，但是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不给他一个矛盾解决的出路，他一定会以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来反作用于企业。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没有引起企业和社会的高度关

注。今天“民工荒”是直接把这个问题的放到了桌面上，“民工荒”的出现，用一句不客气的话讲，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国际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你一脚把劳动者踢开，现在你有订单了、有市场了，你让劳动者回来他就一定回来吗？不一定。我们原来可能是有大量的历史累积的富余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愿意出去打工挣一点现金，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很低、很差，甚至企业欠薪也忍了，再换个老板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对此没有想法和怨恨，更何况新一代农民工的考量可能不太一样了，今天的“裁员潮”使问题显性化，而且是集中显现了。我们不是说在金融风暴过程中企业有了困难也不可以裁员，但是在可裁员可不裁员的时候，依法裁员了也无可厚非，需要谴责的是那些不该裁员而借着金融风暴也裁员的企业，无论哪种情况，现在这样的企业可能会后悔，因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有市场、有订单了却招不到劳动者了。要知道，这些员工也是人，企业的行为对他们的选择是有直接影响的，投桃报李是可能的，以德报怨则未必。企业必须明白这个道理，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在可裁员可不裁员的时候，那些坚持没有裁员的企业，在国际金融风暴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这些劳动者，那么现在企业的订单来了，任务饱满了，劳动者会以感恩之心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都不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样的企业当然不会出现“民工荒”，这样的企业也会有很好的社会美誉度，更多的劳动者愿意来到这样的企业工作，求职者排队应聘潮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直接冲击企业发展模式、管理理念并将产生重大影响。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日本丰田就汽车质量问题接受美国议会质询，受到抨击的时候，丰田的美国员工站在议会门口支持丰田，表现得十分忠诚，这是因为在美国金融风暴的时候，丰田在美国的企业没有裁员，也没有以派遣方式用工，而用的是终身雇佣这种日本的传统用工方式，所以在丰田的美国员工具有感恩之心。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企业关注和反思吗？企业的发展理念难道不应该调整吗？劳动关系虚无化、形式化、单边化、短期化、空心化的问题必须改变，低工资、高工时的模式的确是不可持续的，希望中国的企业还有时间去考量并加以调整。

何解民工荒？

从企业的发展模式来看，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需

要从量变到质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必然要求对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效益的这类企业进行淘汰。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还要关注社会和谐、公平和公正，这说明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关注度提高了，对《劳动法》的执法力度将会加强，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意识也在增强，企业如果再不转变用工方式和管理理念将难以生存。从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剧增的趋势得到控制，现在老龄化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伴随而生的问题是新生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会递减，这个问题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到那时真正的“民工荒”、用工荒将会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了。与“民工荒”同时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等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是真正的、绝对的用工荒，最多是类似在美国出现的制造业后继无人的产业工人荒的现象，但是人口红利不是可持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关注并解决这一问题。

国际金融风暴告诉我们：资本不是万能的，企业不是投资者的私有财产，谁投资谁所有仅仅适用于所投资的财产，而不等于对企业拥有了所有权。企业是一个生产经营性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的，缺一不可。没有人投资的确没有企业，同样，没有劳动者的加盟还是没有企业，资本方投资建立的企业如果没有劳动者来工作，其订单接得越多不是赚得越多，而是赔得越多，更不可能有企业的利润可言。“民工荒”给我们上了活生生的一课，所以，谁投资谁所有谁说了算是不对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如果只是一个轮子转，这辆车就只能原地打转，要想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护和调动两个要素的积极性，实现劳资两利，劳资双赢，共谋发展。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理念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让我们都来关心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让越来越多农民工越来越快地成为有地位、有尊严的产业工人、职业经理人和现代城市人。

南方日报出版社愿意出版发行这样的书，非常值得肯定，有南方的眼界和水准。

序三：把更多人文关怀投向农民工



王同信

深圳市总工会

副主席

吉峰同志花心血编写了这本《蓝白仓库》，力图给打工者在外出打工、城市生活、个人发展、职业规划、人生价值观等方面提供帮助，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作为一个有打工经历的主编，吉峰对打工者的困惑、需求、希冀有着更切实、更到位的体会，这本书对广大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存，有着更具体更有效的指导作用。

据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87.5%，平均年龄26岁。他们年轻、有活力，但仍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知识和技能水平不能适应产业升级和调整的要求等现实问题，来自工作、生活和自我发展等各方面的压力，使他们在城市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的人生态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成长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特区职工队伍的必然要求。

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培训。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两手空空、举目无亲，无资金无技术无经验，唯一的资本就是简单的劳动力，要安身立命，融入城市，要获得较好的收入待遇，提升自我价值，只能靠学习，靠培训，靠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这样才能提升他们的自身素质，才能让他们融入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

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就由政府主导、依托社会及企业对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培训，把从土地上走来的农民、牧民培养成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工人，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而今在IT行业、核工业行业里的骨干，许多就是当年农民工的后代。而后来发展的拉美国家，就不大重视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只让他们从事简单劳动，居住在贫民窟里，形成当今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割裂局面。现代化对于物质条件的依赖是相对的，但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绝对的。提高人的素质，关键是教育。在深圳，要调节贫富差距、谋求社会公平、实现体面劳动、达致社会和谐，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广大劳务工的教育。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可能建立在劳动力主体素质得不到保障提升的地基上。新的发展模式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支撑。深圳市委、市政府已清醒地意识到提升劳务工的整体素质，释放这一群体中蕴含的巨大潜能，是打造和谐深圳的重要环节。深圳的劳务工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对他们而言，深圳不应只是人生的一处驿站，更应该是一所学校，一个家园，一个使他们的素质得以提升、人生价值得以体现的乐土。深圳应该感谢他们，回报他们，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机构、企事业单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参与到打工者公益教育的行动中来，为农民工提供数量更多、更低成本的学习机会，使他们愿意学习、能够学习，并通过学习提高素质，搞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2011年3月12日 深圳

序四：有尊严的游民，有尊严的生活



曹 轲

南方网总编辑

南方都市报

总编辑

吉峰的经历看上去简单。他来深务工16年，当过保安、司机，送过花，也当过餐馆服务员，做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后又失去。在某些方面，吉峰又是个谜。一个农民工，偕同教授和企业家发起劳资关系发展论坛。现在，他又作为主编，邀请政府、企业、农民工群体、学界和社会人士共同写作一本让打工者“自教育、共言说”的书籍。他的所为总是超出你的想象。是什么触发了他写作的念头？是什么让他对农民工问题保持如此力度的关注？又是怎样的能力，让他每一次都把想法化为现实？

意料之外与负债感

记住吉峰，是因他自许为“农民工”的勇气和骨气。在2008年9月6日纪念广东改革开放30周年深圳论坛上，他站起来大声地向台上提问，以农民工的身份。后来才知道，他的网名“农民工”在公众舆论平台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发起主办的劳资关系发展论坛从2008年起年年举办，只要有会、有场合表达，他都抓住不放，而所有的意见均从农民工而来，代农民工而言，为农民工而呼。

有机会和他面对面交谈时，终于亲身领教了“农民工”的胆识和见识。2009年5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举办媒企关系高峰论坛，与农民工似乎没有直接关系，想不到他来了，还用900元竞拍到与国际顶级营销大师米尔顿·科特勒先生的午餐机会。